

2014

JIAXIU
FORUM

甲秀论坛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2014

JIAXIU
FORUM

甲秀论坛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甲秀论坛. 2014 卷/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编. —北京: 中央民族
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660 - 1133 - 6

I. ①甲… II. ①贵…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0738 号

甲秀论坛. 2014 卷

编 者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策划编辑 舒 松

责任编辑 徐桂红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 87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1133 - 6

定 价 48.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甲秀论坛”（2014 卷）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吴大华	金安江	
副主任：	汤会琳	王朝新	唐显良
	宋 明	索晓霞	
成 员：	罗 剑	杨雪梅	戈 弋
	方 翌	刘 岚	张 松

目 录

从三次国际经济危机得到的经验教训

——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的创新	汪同三 (1)
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周晓虹 (12)
关于中日关系史的一些问题与思考	杨 群 (25)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刍议	黄速建 (32)
走近晚明	商 传 (46)
以双轨战略塑造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张其仔 (68)
试析中印思维模式的特点	
——兼论东西方文明影响的差异	孙 晶 (88)
文史脉流行动数字古迹导览服务平台之系统设计与使用	黄崇明 (99)
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进一步改革的认识	唐 忠 (112)
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国际影响力研究	
——基于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张国良 谢天勇 (121)
土司制度与元明清三朝治夷	方 铁 (129)
云计算与区域经济发展	曾 宇 王 洁 (140)
凸显主体行为的经济学及其演变	蒙爱军 (157)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基于国家诚信制度建设视角	吴大华 (166)
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城乡一体化研究	索晓霞 李 桃 郑迦文 (183)
组织建设从严重在“管干治吏”	
——试述习近平总书记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系列思想 ...	雷厚礼 黄亦君 (210)
苗语对“专职巫者”称谓的音义辨析	麻勇斌 (244)
物权法及其相关的热点问题	李 洁 (265)
后记	(277)

从三次国际经济危机得到的经验教训

——宏观调控思路和方法的创新

汪同三

三次国际经济危机，是指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 2008 年、2009 年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以及 2010 年、2011 年以后出现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三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冲击很大，对中国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对这三次国际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应对措施，这些应对措施有不同的特点，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在国际上的反响也有所不同。

20 个世纪 90 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人民币不贬值。

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各个国家的应对危机之策，就是如何设法减少自己的经济损失。普遍的做法是，主动以各种方式使本国货币贬值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因为货币贬值以后可以增加出口，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当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之后，其他各国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也包括中国台湾地区，都纷纷使自己的货币贬值以求自保。但是，在诸多的东亚经济体中，有一个地方不能这么做，它就是中国香港。因为香港的政策是港币和美元挂钩，香港经济是和美国经济绑在一起的，这也是保持香港经济繁荣的重要政策之一。因此，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其他国家都可以搞货币贬值，唯独香港无法用这个办法来减少它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所受的损失，所以当时香港的楼市、股市一塌糊涂，一泻千里。

还有一条是政治上的原因。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中国，在回归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国际上不少人质疑，香港回归中国以后中国政府如果管理不好，香港的经济就会出问题。巧合的是，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中国，正好碰上 1997 年夏天爆发亚洲金融危机，香港经济一片萧条，似乎也给那些质疑的声音提供了证据。当时我们面临的任务，不仅仅是要搞好大陆本身的经济，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设法保护香港的经济，帮助香港经济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所以我们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策略。

人民币不贬值，等于把人民币和美元挂上钩，港币也是和美元挂钩，一个很简单的数学等量代替，就等于人民币和港币挂钩了。我们用庞大的大陆经济来保护香港的经济，使香港经济能够遏制当时凶猛下跌的趋势，逐步取得了经济复苏。执行

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大陆经济和香港经济都能够有效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得到一些恢复，成绩是肯定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执行人民币不贬值政策，我们在其他方面也遭受了一些损失。

一是我们出现了通货紧缩。

图 1 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图中线 2 是 GDP 增长率，线 1 是 CPI。我们国家价格波动的特点，是绝大多数年份线 1 在零线以上，就是通货膨胀，而且有时候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最高点是 1994 年，通货膨胀率曾经高达 24.1%。唯独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000 年前后这几年，线 1 是在零或者零以下，那段时间出现了通货紧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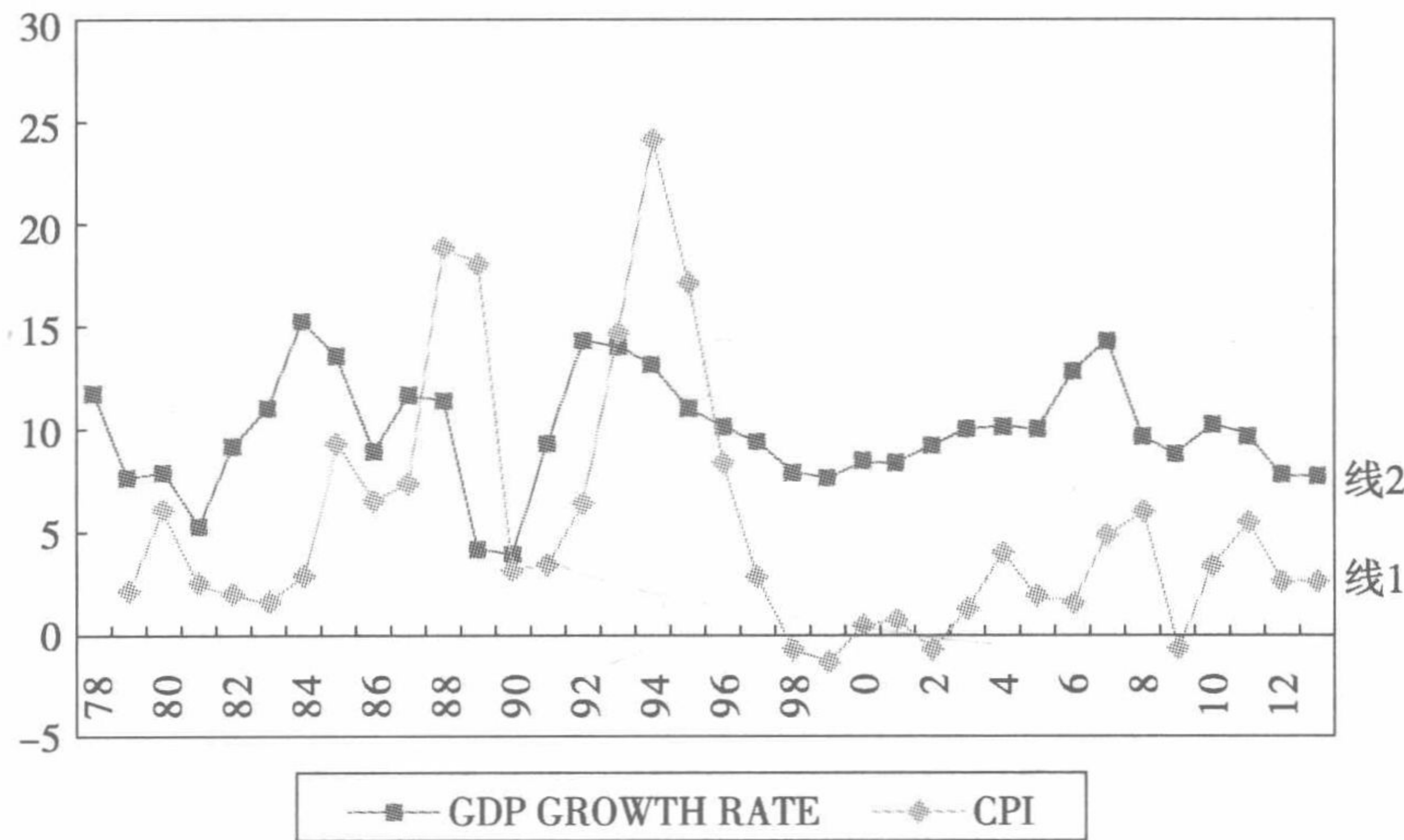


图 1 1978—2013 年中国改革三十多年宏观经济

从经济学上来讲，在一般情况下，宁可有点通货膨胀也不要通货紧缩。为什么？从短期来看，通货紧缩能给消费者带来好处，商品便宜了，大家可以多买一些东西，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但是从长期来看，通货紧缩不利于经济发展。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辛辛苦苦地工作，就是希望以后生活得比现在好一点。如果你想以后比现在生活得好一点，就需要有比现在更多的收入，所以你就必须要有比现在更多的产出。如果你要有比现在更多的产出，就一定要使以后的生产规模比现在大，或者生产效益比现在高。因此，你现在就要投资，因为你不投资这些目标就实现不了，你也就没有办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你要投资就要限制自己的消费，把这部分收入拿去投资。一个人必须具备两种功能，一个是消费功能，一个是投资功能，这样才能使人活下来，而且以后生活得会更好一点。

马克思讲，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家才具备投资功能，而工人阶级只具备消费功能，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来工资养活自己和家庭。所以在资本主义社

会下，一个劳动者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只具备消费功能而不具备投资功能。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工人名义上是当家做主，但是仍然只具备消费功能，不具备投资功能。那时候居民把很少的余钱存起来，既不叫存款，也不叫投资，而是叫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投资功能在国家，是国家从资本家手里接替了投资的功能。只有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搞市场经济了，中国的老百姓才逐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不仅具备消费功能，而且也开始具备投资功能，普通劳动者买点股票，存点钱，买点债券，都叫间接投资。

假如我决定限制现在的消费，拿出一些钱去投资生产矿泉水，预计两年以后投产。现在矿泉水是1元1瓶，如果两年后我的工厂投产，矿泉水依然是1元钱1瓶，我就会愿意投资。如果通货膨胀了，两年以后生产的矿泉水能卖到1.5元1瓶，我的投资积极性就更高。但是，如果通货紧缩，两年以后生产的矿泉水只卖到0.7元1瓶，我投资意愿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投资。所以我们宁可有点适度的通货膨胀，而不要通货紧缩。由于我们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从1998年以后一直到2002年，我们都是处于一种通货紧缩的状态。

日本萎靡不振的关键因素，是日本经济长期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所以安倍晋三采取一系列宽松政策来刺激日本经济，期望尽快扭转通货紧缩状态。前一段时间欧盟国家价格出现了下跌，只有1%左右的CPI，引发一片担忧，怕欧洲陷入通货紧缩状态。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过一段通货紧缩，也就是唯独这么一段时间，在其他的年份都处在通货膨胀状态。

二是当时中国经济的走势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发生了背离。

图2中上面的线是中国经济，下面的线是世界经济。虽然中国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增长快，但是趋势差不多，走势是一样的。一开始都是受经济影响下跌，后来慢慢都有所恢复。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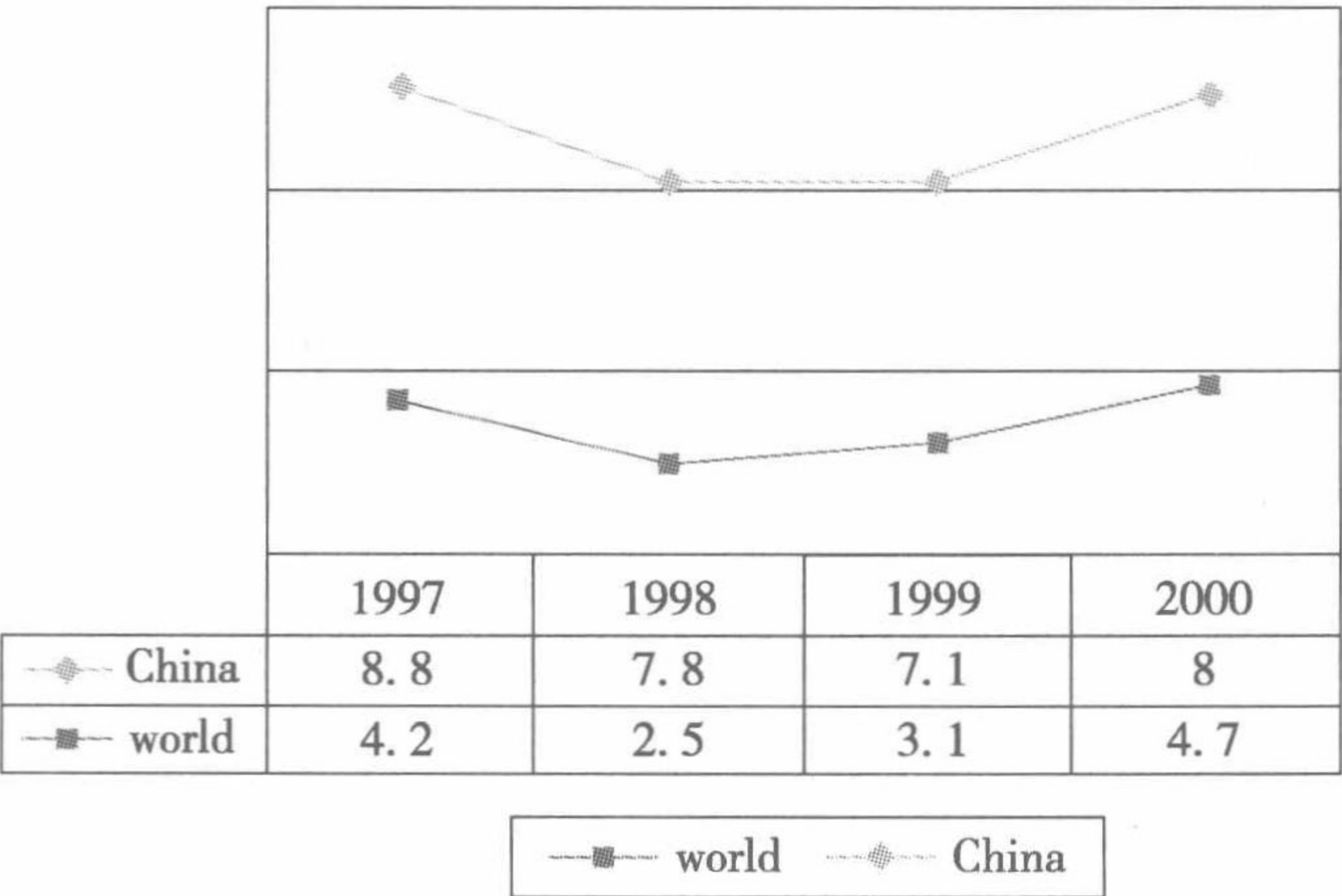


图2 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全球与中国经济增长率对比

第一个问题，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 1998 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趋势是一样的，都是在向下走。但是到了 1999 年世界经济开始上升，1998 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是 2.5%，到 1999 年已经提高到 3.1%。中国经济 1998 年是 7.8%，1998 年继续下降到 7.1%。到 2000 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趋势都是在向上走，但是仔细去分析它的数量，2000 年世界经济已经恢复到 4.7% 的增长率，已经高于 1997 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 4.2% 的增长率，而中国经济到 2000 年只恢复到了 8%，仍然低于经济危机爆发时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在 2002 年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位领导同志都在讲“抓住战略机遇期”。正是在十六大前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这样一个趋势上的差别，我们的最高领导人提出来，要紧紧抓住新世纪初的战略机遇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继续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为什么要提出“抓住战略机遇期”呢？就是当时我们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所带来的结果。

我们应对前不久美国金融危机，采取的对策简单来讲就是 4 万亿元刺激计划。当时采取 4 万亿元刺激计划是必要的，这个计划也产生了非常积极和重要的成果。社科院做过一个模拟，用反事实的模型方法做一些定量的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是，我们的 4 万亿元投资计划对 2009 年 GDP 增长贡献了 1 个百分点，对 2010 年 GDP 增长贡献了 0.7 个百分点。如果我们没有这 1 个百分点，当时的经济增长就会出现大的问题，这一点首先是要肯定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是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措施，这样一个计划必然会对其他的一些方面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可以从 4 个方面去分析，分别是通货膨胀问题、产业结构逆向变化的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和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问题。

表 1 大量增加的银行贷款

年度	银行新增贷款（RMB）	贷款增长率
2008	4.17 万亿元	15%
2009	9.63 万亿元	32%
2010	7.5 万亿元	19.9%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前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通货膨胀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通货膨胀？首先，2008 年在执行 4 万亿元计划之前，当年银行新增贷款增长 15%。2009 年开始执行 4 万亿元计划，新增贷款增加量一下增加了 32%。到 2010 年又增加了差不多 20%。这样大量的贷款增加，使得流动性大大增加，造成了出现通货膨胀的流动性基础。

2009 年开始实行 4 万亿元计划的时候，这 4 万亿元里面只有 1.18 万亿元是政府从财政里面拿出来的真金白银，剩下的两三万亿元从哪来呢？就要从各个方面去融资，包括银行的贷款等，最终造成的是流动性大大地增加，明显地增加了通货膨

胀压力。一般来讲，欧盟认为通胀率在1%—2%算是正常的价格波动，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稍微放宽到3%。3%—5%叫作温和的价格上涨，不会产生什么太严重的问题。超过5%，就是需要密切关注的通货膨胀了。超过10%是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

因为通货膨胀有滞后性，2011年年度通货膨胀率5.4%，已经进入了比较危险的状态。如果看月度通货膨胀的话，2011年有4个月的月度通货膨胀超过了6%（见图3），这是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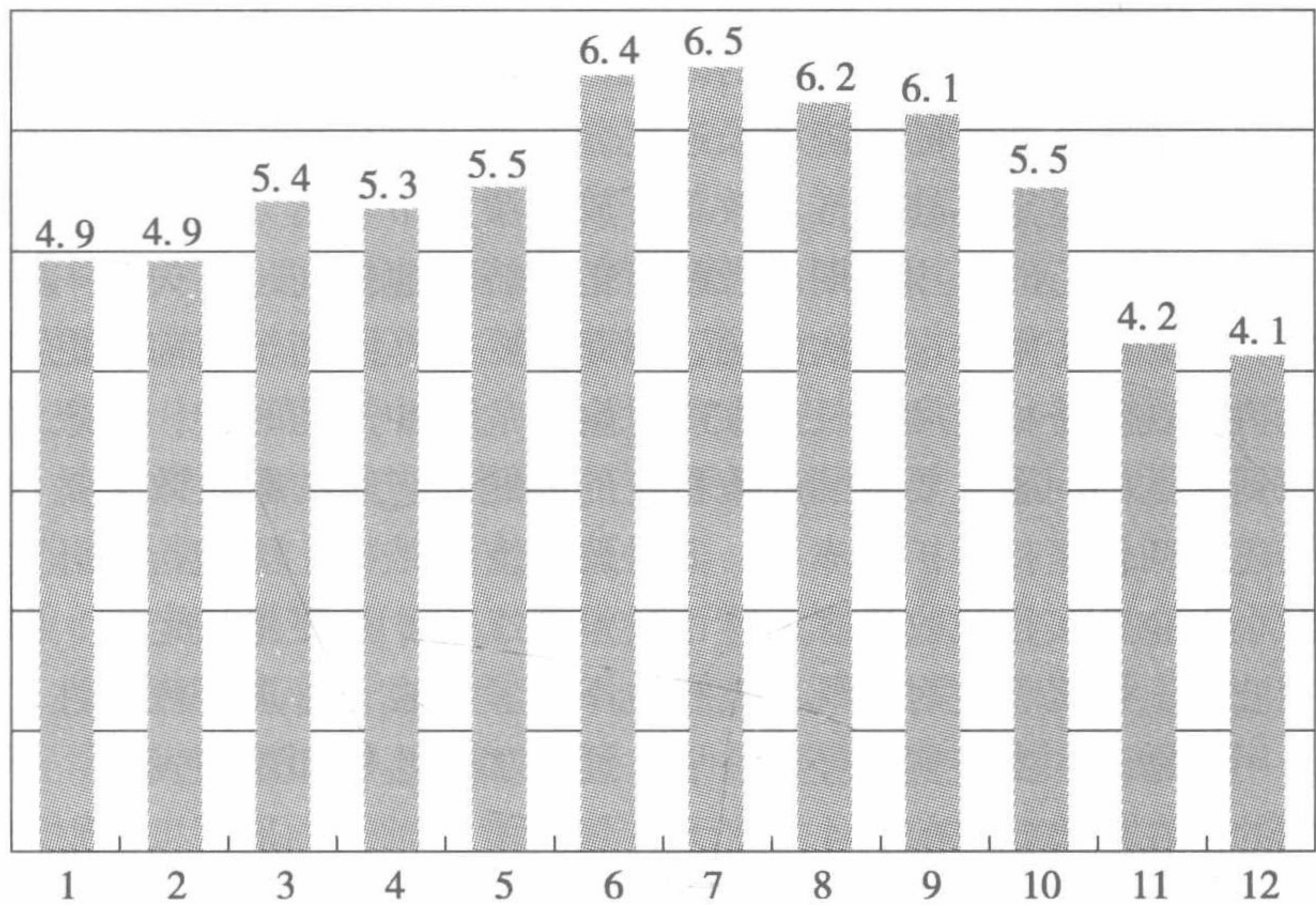


图3 Monthly CPI, 2011

第二个问题，产业结构出现了逆向变动。从十六大开始一直到十八大，我们都在强调调整产业结构。一个最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就是我们希望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上升，相应的工业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下降，这是我们的要求。“十二五”规划提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但是在执行4万亿元计划的那几年中，2009年、2010年这两年的产业结构出现了逆向变动。2009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46.2%，到2010年上升到46.7%。200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43.4%，到2010年下降到43.2%。我们原本希望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但是它上升了，我们希望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但是它下降了。

此外，还有产能过剩和地方的政府性债务的问题。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而且这两个问题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们采取4万亿元计划之前就已经存在，由于4万亿元计划的执行，使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也变得很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问题又进一步恶化了。

应对前两个金融危机，对亚洲金融危机我们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在美国

金融危机中，我们采取的是4万亿元计划的政策，当时国际上都是一片叫好之声，都说中国做得好、做得对，中国拯救了世界经济。但是到了第三个金融危机，也就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时候，我们听不到国际上像以前那样热情的表扬了，好像中国不再是救世主了，反而听到的是一片质疑甚至是批评。的确，在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与以往两次金融危机不同的政策措施。最早的表述是2013年夏天，达沃斯夏季论坛在大连举行，李克强总理有一个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我们要兼顾当前和长远，稳定宏观经济政策，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着力激发市场活力，着眼转型升级，调整优化结构。

在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如何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当时那一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李克强在大连达沃斯夏季论坛上讲要兼顾当前和长远，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着眼转型升级，调整优化结构。经济下行时，用短期刺激政策把经济增速提高，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权衡利弊，这无助于解决深层次问题，因此需要选择既利于当前，更惠于长远的策略，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要想到深层次的问题，要想到长远的问题，要想到政策稳定的问题。当时的财政政策是什么？李克强总理的表述，叫作坚持不扩大赤字，而是调整支出结构，压缩行政开支，加快支出进度，对小微企业实行税收优惠。货币政策什么呢？是要保持定力，即使货币市场出现短期波动，也沉着应对，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管理好流动性，重点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通过加强监管和规划发展，积极化解财政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以前在4万亿元计划政策的时候，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扩大赤字。2008年我们的财政赤字只有1700亿元，到2009年扩大到7000多亿元，增发国债规模。2013年的财政政策还叫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它是通过调整结构，加快支出，压缩行政开支，对小微企业实行税收的优惠，来起到扩大赤字的效果。我们的货币增长还是维持着那个公式，就是说GDP的增长速度加上通货膨胀率，等于货币的增加速度。比如说全国一年只生产1瓶水，这瓶水10元钱，它的生产和流通需要多少货币呢？需要10元钱。如果明年一下子增长了100%，生产出2瓶水来，还是10元钱1瓶，需要多少货币？需要20元钱。如果这瓶水今天10元钱，明天变成15元钱了，又生产出2瓶来，需要30元钱。这个公式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加上价格上涨等于货币供给的增加速度。

看一下表1，2008年贷款增长率15%，经济增长10%左右，通货膨胀率上升了三四个点。这个公式在一般情况下不是严格的等于号，在经济上升的时候应该是大于等于号。就是说货币增长速度要大于等于经济增长速度加上通货膨胀。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贷款增长15%是基本合理的，它略大于经济增长速度加上价格上涨。而2009年的32%和2010年19.9%，就明显地大于了那个实际需要。所以，在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货币政策是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年初制定的M2的增长速度大概是14%，它基本上是略大于经济增长加上通货膨

胀。所以这个才叫作稳健的货币政策。

我们比较熟悉的9个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是在2013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来的。我们要兼顾3个方面，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强调稳增长，而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当时李克强提出来一个“合理区间”的概念，要根据经济发展潜力和当前实际，科学确定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守住稳增长，促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线”。这个概念提出来，当时被理解还有一定的困难。比如下限是7.5%，是个大的数，上限是3.5%，是个小数。一个讲的是GDP增长率，一个是通货膨胀率，这两个怎么可以放到一个区间的两头呢？学数学的人会觉得这个说得太没道理了。但是它是很形象的。这个概念从2013年年中提出来以后，现在大家都接受了，国际上也都认可了，觉得讲得比较形象，可以比较深刻地说明实际的情况。

提出这样一个合理区间的概念，李克强讲，只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宏观经济政策就要保持基本稳定。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改革创新，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就是我们在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就是说要对宏观调控进行更深刻的思考。而且不仅仅是思考，而是要对我们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有效的反思。

原来我们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政府干预，扩大财政支出，目的就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宏观调控不仅是一个经济速度，而且还提出政策手段的机制化，宏观调控需要有一套东西限制它，不能随意来。所谓机制化，就是不是随意的，是有规律可循的，是有原则要遵循的。十八大讲的是加快宏观调控机制化的建设，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讲的是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表述，比以前我们对宏观调控理解的范围是扩大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的宏观调控主要任务有4条。

1. 要保持经济总量平衡。这也是以前我们理解宏观调控必有的内容。
2. 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率布局优化。这是以前没有想过的。
3. 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这个以前想到过。

4. 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又是以前没有想到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描述的宏观调控提出来的4条，有两条是我们能够理解的，第二条和第四条则是以前没有想到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宏观调控的内容包括：

1. 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短期调控措施要和中长期总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相符合。

2. 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

第二条前半句是我们以前知道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进一步要求，不仅仅要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主要手段，而且还要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的机制化。也就是说，还要有一个原则，有一个框架来管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能随意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机制化这个词确实是很重要的。

3. 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

现在又讲到了这两个主要的政策要和其他的政策协调配合，需要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和实践，结合理论去分析，去研究究竟怎么去做，从理论上应该怎么描述这些话。

4. 相机抉择，增加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协同现在是时髦词，在经济政策上、宏观政策上、宏观调控上，究竟如何协同？如何理解协同？

5. 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宏观调控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一家的事情，它也应该是对外开放的。要去参与国际上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这个协调，要推动国际经济的治理结构的完善。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于宏观调控专门讲的一段，主要讲了两个内容，一个是现在对宏观调控的任务是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另一个是宏观调控工作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201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最新的一个表述了，讲的是要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不光是对宏观调控的思路创新，还要对宏观调控的方式创新。比如刚才讲到协同，就是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创新宏观调控思路 and 方式目的，是为了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面对跌宕起伏的经济形势，我们保持定力，明确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只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就集中精力抓住转方式、调结构不放松。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不动摇，以增强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

我们回过头去看，2012 年召开的十八大，2013 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直到 201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这 3 年中的这 3 个文件，对于宏观调控一些表述的演化过程，我们可以感受到宏观调控思路的创新。当然我们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表述的变化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说明它是在与时俱进，也需要创新，真正把它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理论，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

当前我们为什么加强宏观调控，为什么对宏观调控要创新？

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来，说我们现在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增长的内升动力尚待增强。我给大家做一些分析。

从国内来看，2012 年 GDP 增长 7.7%，2013 年 GDP 增长还是 7.7%。看起来这两年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分析一下，我们会发现这两个 7.7% 的背后是有不同的。

2013 年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是 9.7%，比 2012 年降低了 0.3 个百分点，工业增

加值是反映实体经济增长的情况。2013 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是 19.6%，比 2012 年的投资增长下降了 1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是反映实体经济状况的，制造业投资 2013 年增长了 18.5%，比 2012 年下降了 2.8 个百分点。而且 2013 年的 18.5% 的制造业投资的增长是 2000 年以来最低的。非国有企业 2013 年的投资增长是 22.4%，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快。但是 22.4% 比 2012 年还是下降了 2.4 个百分点。2013 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 7%，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 9%。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比 2012 年下降了 2.6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比 2012 年下降了 1.4 个百分点。2013 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长 11.5%，比 2012 年的数据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2013 年财政收入增长了 10.1%，比 2012 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低两个多百分点。

这些数字说明，如果我们看 GDP 的话，2012 年和 2013 年增长率都是 7.7%，但是我们认真分析投资和消费，分析居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就可以看出有比较明显的下降。

再来分析今年一季度的数字。今年一季度的投资、消费、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与去年同期比增速都是在下降。从三大需求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来看的话，2013 年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为 50%，比 2012 年下降了 5 个百分点；进出口贡献率继续下降到 -4.4%。资本形成的贡献上升到 54.4%，比上一年提高了 7.3 个百分点。在两个 7.75% 背后的那些数字，从反映在三大拉动经济增长因素的贡献率来看，都出现了我们不太希望的这样一种变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 CPI 和 PPI。CPI 这些年一直保持着一个正的 2%、3% 的上涨，但是 PPI 已经连续 25 个月是负值了。这样的话，在 CPI 和 PPI 就出现一个剪刀差，这样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CPI 和 PPI 的背离，显示出我们实体经济增长的困难，暗含着我们产能过剩的问题，因为价格上不去就会大大影响供给的积极性。

当前存在经济下行的压力的原因，应该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来分析。长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转变的长期因素，又有许多需要我们积极应对的短期因素。

从长期来看，有 4 个因素使我们增长速度应该减慢。

1. 不再单纯追求高速度，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统筹经济增速、结构调整、提高质量效益多目标发展。邓小平给我们制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翻两番”，它是一个纯经济增速目标。当时的中国经济实在是太落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描述是，我们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面临崩溃的边缘。所以邓小平给我们制定的目标就是一个，把经济搞上去，把经济增长速度提上去。改革开放 30 年以后，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是世界第二了。但是各方面累积和沉淀下来的矛盾和问题，告诉我们不能再单纯地去追求经济发展高速度，必须要实现一个多目标的发展。

习近平主席讲的中国梦，就是一个多目标。经济发展是实现多目标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更不是全部条件。要实现多目标发展，经济增长是要减速的。

2. 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就是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在减

少，这也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供给相对宽裕的局面不复存在，劳动力成本在刚性上升。

3. 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减缓，资本形成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有所趋降。我们特别强调，结构调整是要加强第三产业，加强服务业。服务业的单位劳动效率，特别是普通的、生活性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低于工业和制造业的。所以这样一种结构的调整，也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

4. 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考虑这些因素，考虑生态的因素、资源的因素和环境的因素。

从长期因素来看，经济增长速度要减慢。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以后，很多发达国家意识到他们存在服务业过度发展、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所以他们一方面试图实现再工业化，另一方面加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使得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经济环境日益严峻，这些也会对我国经济形成较长期的下行影响。习近平所讲的“倒逼”，就是外部条件不像以前那么自由自在了，是越来越趋紧的，迫使我们更加重视做好自己的事情。

从短期因素来看：

1. 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

2. 增长速度的一个较大的降幅，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较大，克服这些影响的冲击需要一定的调整时间。

3. 在特殊时期针对特殊问题的政策措施的特殊性，刺激措施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产生了一些影响，一定时期内消化这些影响的话也会带来经济下行压力。

在分析现在下行压力的时候，要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去看原因在哪里。我们怎么去认识和如何去化解经济下行的压力呢？要区分产生下行压力的长期趋势因素和短期波动因素，对这两种因素要做不同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刚才讲的那几条长期因素，要正确认识现阶段出现经济下行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不能够没有办法也不应该去阻止，它是客观的、必然的。因此，我们要积极面对经济增长换挡减速的现实，把握这样一个机会，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步伐。

现在有几个新的提法，是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都谈到的。

1.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2. 我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变，必须适应“新常态”。

3. 创新宏观调控思路 and 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这些思路应该好好地去研究，怎样能够真正地做好，克服经济下行压力的工作。特别是创新宏观调控思路 and 方式，它的意义在哪里，有以下几条。

1. 明确调控区间的数量界限，极大加强了调控政策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透明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可预期性，以前外国学者跟我们讲，中国的政策不可预期，现在政策就可预期了。比如发改委还没有调油价，那些投资公司早算

出来了，说你这两天该调了。你的机制和大的原则在那里，人家根据你的机制和原则就知道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搞出其不意实际上不是好办法，一定要使政策是可预期的。之所以能可预期，是因为政策背后是有规矩的。

2. 明确把保障就业放到更加重要、更加优化的位置，只要就业水平有保障，增长的下限和物价的上限可以有一定弹性。李克强总理讲了下限 7.5% 和上限 3.5%，也是可以有弹性的。就业是必保，没有弹性。只要就业水平有保障，增长的下限和物价的上限是可以有弹性的。核心目标刚性最大的是就业。

3. 短期宏观调控要围绕长期目标实施。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中时，宏观调控更多考虑的是长期目标实现的问题。

4. 保持定力，沉着应对，针对具体问题出台综合施策，兼顾宏观微观，更加注重微观，精准发力，有效降低政策成本，实现政策效益最大化。

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样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有一次有个人给我提了一个问题，说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区别是什么？当时我想了想，说宏观经济学讲的是总量，微观经济学讲的是效率。为什么微观讲效益？效益是有边界的，在某个边界之内效益最大化。宏观经济学是无边界的，是整个都包括的，怎么去讲它的效益？宏观经济学讲的是 GDP、价格、就业，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考虑的是在宏观层面上怎么体现效益。所以讲合理区间，要求我们要兼顾宏观、微观，更加重视微观，要精准发力。精准发力的目标是要降低政策成本，使政策效益最大化。我们讲宏观调控也得讲讲效益，讲讲成本。现在有个词叫微刺激，不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就可以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

5. 在宏观调控中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更坚定地把应该由市场解决和能够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解决。

〔作者简介〕

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主要学术专长是经济模型，长期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主要代表作有：《宏观经济模型论述》（专著）、《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合译）、《大道理论与大道模型》（论文）、《对 1991 年、1992 年的经济预测及分析》（论文）、《中国客观存在观经济计量年度模型和分析》（论文），参加写作和编审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模型》一书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参与与美国学者的模型研制合作项目，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础上，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承担总理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至今已 10 余年。此项目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并得到有关国际机构的资助。在进行经济预测的同时，对现实经济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

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周晓虹

虽然人类社会的变迁自古有之，但是变迁成为人类关注的社会事实或者成为人类自觉思考的主题，却和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本身一样，是因传统社会的断裂而生的所谓“现代性”（modernity）的产儿（Giddens, 2003: 16; Westwood, 2000）。熟知现代社会科学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其内在的主要成就和基本规则主要都来自近代以来欧洲社会那场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迁。说简单一些，变革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就是西方或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遗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提出，应该努力将改革开放 30 年多来中国发生的巨大的社会变迁转化为学术（周晓虹, 2010a），否则就会像黄万盛所言，“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黄万盛、刘涛, 2009）。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不但迅疾，而且因其特殊性而蕴含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研究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理应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一、社会科学是社会变迁或现代性的产儿

尽管人类社会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但真正具有质的意义的大变动只有两次：一次是公元前 5000 年左右发生的“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本身的出现”（亨廷顿, 2010: 47）；另一次即 18 世纪自欧洲开始延续至今的波及全球的所谓“现代化”，作为从传统到现代或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地一场社会变革”（罗兹曼, 1988: 5），它“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亨廷顿, 2010: 47）。如果说在公元前 5000 年，无论是人类本身的心智还是社会的复杂程度都还不允许我们的祖先分析和讨论文明出现的意义，那么作为现代性或变迁之子，自 18 世纪开始孕育的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面对愈益频繁而复杂的社会变迁，凭借因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获得的各种实证手段，开始了对人类社会变迁的自觉思考。如此，从现代社会科学出现的时间顺序来看，先是经济学和社会学，接着是历史学和人类